

# 四川省社会学研究十年之我见

文 献 良

四川社会学恢复已十个春秋，状况如何？笔者就此谈一点浅见。

## 一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他的讲话为近30年人们不敢问津的社会学恢复了名誉。社会学重新登上社会科学舞台，从中央到地方开始了对社会学的重视和重建。四川和全国一样，1980年起开始培训人才，1981年至1983年四川社科院、成都社科所、重庆社科所、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1982年春省社科院院长陈文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晓风亲自主持成立社会学学会筹备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应邀在社会学学会筹备组会上作报告。1983年社会学学会成立，由胡晓风任会长，挂靠在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专程来川祝贺和做学术报告。与此同时社会学教学也在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大专院校陆续开设起来。组织上的重建任务基本完成。

组织与队伍建设是社会学重建的外观，重建什么样的社会学，才是社会学重建的本质问题。对此，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理论家一开始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1979年3月15至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筹备处邀请北京和部分省市的老社会学家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共青团等实际部门的领导和热心于社会学重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讨论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工作。胡乔木在会上做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的讲话。费孝通教授就怎样重建社会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意见。与会同志统一了在中国要建立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的重建方向。

1982年5月费孝通教授在四川社会学学会筹备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学里设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就这门学科来说，还有待于创新，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

1983年4月雷洁琼专程来川，在四川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做了《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新建系统的中国社会学》讲话。她特别强调，我们要建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并主张组织力量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课程。”她还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要研究实际问题，也要研究自己的理论。”大家应该好好研究

马克思关于社会学的理论。”

社会学学会将上述中央领导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讲话精神，通过《社会学，青年参考资料》印发全川，这为统一全川社会学研究思想、端正研究方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3年至1985年是四川社会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力以赴开展社会调查。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四川的特点，调查社区以农村为主，调查对象以青年为主，调查问题以青年特点、青年犯罪、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变化为主；调查方式以抽样与典型调查、文献资料收集三结合为主。在此期间比较大型的调查有九县《农村家庭抽样调查》、五县市《青年农民现状调查》、《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调查》、十场所《青少年犯问卷调查》、《成都市东城区如是庵街居民段婚姻、家庭调查》以及《渡口市城区职工社会心理调查》等。通过调查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交了近十份调查报告和对策建议，出版了《四川农村家庭调查资料集》、《青少年犯罪个案研究集》、《四川农村婚姻现状与对策》、《乡村发展与青年》、《青年与行为科学》、《献给80年代的农村青年》等等专题调查报告、资料集。此外研究者们还就这些材料写出了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全国各期刊或论文集上发表。

## 二

从1986年起，四川社会学界转入了研究为主，除了承担省内《农村婚姻现状》、《四川女职工调查》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调查》这三项调查以外，没有再开展上千人的大调查。

（一）10年内四川社会学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1.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否具有社会学学术传统，四川同仁对此持肯定态度。有人提出传统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本质及其运转规律的一般看法，虽然它本身不是社会学，但它是进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的依据和出发点。列宁最早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学，它是一篇捍卫和阐明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学的著作。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不仅指唯物史观为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事件、人物等具体社会学研究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和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和经验，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关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问题。有人认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指导眼前社会学研究；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而必须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大部分人认为社会学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但是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不能由历史唯物主义取代。正象历史唯物主义要指导其它科学研究而又不能取代其它社会科学一样。还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学科中的一种学说，它本身不是一种学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不在于硬把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而

在于正确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在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少数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其理由是两者研究对象都是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从总体上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总体结构、发生发展的动力和过程等理论和方法。由此,不能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学。有人指出把历史唯物主义划分为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唯物主义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学。

2.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四川社会学界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继承和研究毛泽东的社会思想,并以此作为起点发扬光大。因为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中,创造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论著和社会调查方法、资料。所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社会思想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起点。

在继承毛泽东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四川社会学界一致认为在毛泽东著作中有丰富的调查研究方法和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重在应用是毛泽东认识社会的特点,这些都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宝贵财富,应加以整理、继承和发扬光大。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著作中不仅有鲜明的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有联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理论,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去创立社会学体系,但是他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促进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社会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从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论着手研究他对社会与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不仅包括毛泽东的社会理论、立场和方法,而且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社会学思想。有同志特别提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有关正确处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协调社会整体结构和部分结构间的关系,使之趋于优化,以及对社会进行动态考察,更是社会学中国化中应该特别珍惜的宝贵财富。

第二种意见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过程中发展民族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以上两种意见都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角度出发,把社会学中国化放在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和方法上。

另外两种意见中没有特别强调学派性质。

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以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和结构为核心,通过研究揭示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建立宏观社会理论,发展分支社会学理论。这里社会学中国化与现代化合二而一了。另一种意见是从文化角度分析社会学中国化。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建立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体现中国现代文化民族主体性特色,反映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社会学体系。

我们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合理内核和先进方法来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的社会思想和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已经中国化了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我们的任务是挖掘、整理并结合建设实践加以发展和运用。在研究社会学中国化时,就该把继承、借鉴与民族化区分开来。“化”是彻头彻尾的消化、吸收与新生,不是简单的继承或借鉴与生搬硬套。我们要把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

里继承来的社会学传统、从西方社会学中吸收的精华，经消化转化为符合中国国情、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所用的社会学。各学派观察、研究社会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从而对民族化社会学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也不同。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必然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去研究社会学中国化。

在讨论社会学中国化时，必然牵涉到如何对待西方社会学问题。80年代初较多人认为，西方社会学受意识形态影响很深，在引进西方社会学时，要摒弃其资产阶级哲学色彩，吸收其对我有用部分；也有人认为西方社会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借鉴西方社会学，只限于吸收其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个别人甚至主张吸收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改造，否则会“输入垃圾”。80年代中期以来，较多人认为，西方社会学从总体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由于它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因此，不仅不反对其研究方法，而且对其理论也不应简单一概排斥，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吐其糟粕，吸其精华。还有人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合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来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与借鉴西方社会学精华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指出，没有继承和借鉴是不行的，“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学界对西方的理论引进与嫁接的较多，联系中国实际改造、创新不够；对西方社会学派的著作、观点翻译、介绍、推荐的多，对其资产阶级哲学色彩批判不够，需要引起注意。

3.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四川社会学界有以下一些观点。1) 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化过程和各侧面相互协调及运转的规律的科学。从而把社会学定义为“关于现实社会的结构、功能、运转和变迁的一般原理，以及关于社会生活管理原则与方法的学科。”从这一概念出发，其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整体化、全方位观察社会。2) 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科学。从这一观点出发，其学科体系重在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 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过程的科学。其研究重心放在对社会过程观察和“确切地描写。”此外，还有认为社会学没有单一研究对象，它包括社会生理学、社会病理学、社会医学、社会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等五部门研究。

顾名思义，社会学应该从总体上研究社会，包括社会运转、结构、功能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然而，社会这台大“机器”包罗万象，从不同角度或方面去研究它也是可以的。所以，一百六十多年来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为世人公认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对此问题至今仍有七八十种不同的认识。我们自然也没有必要去寻求一致与统一的研究对象。要紧的是这种研究是否结合中国实际，能否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

(二) 在应用研究上，10年来有以下不同观点和认识。

1. 如何看待80年代的青年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青年是人民生命的源泉”、“革命和建设的先锋”的论断并未过时。这是由青年自身的特点以及青年和共产党之间有血肉联系决定的。80年代的青年处在经历了历史大曲折后的社会大变动中，大曲折的影响和对大变动的不适应必然会在青年中反映出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青年现状和面貌，但不能由此而否定青年的先锋作用。但青年的先锋作用不是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党的教育和老一辈的引导。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代青年是“难教育的一代”、“先天不足”

的一代，有反传统、不听话的共性。由此，不能把他们“捧”得太高，要切实加强教育。他们说，毛泽东同志说青年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方面军，但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工农大众（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所以，中国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起先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的研究。一些人通过实地调查后指出，当代大学生热爱祖国，渴望四化，但不少人缺乏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勤于思考，要求改革，但缺乏马列主义世界观作指导；爱科学、肯学习，但一些人缺乏革命人生观；爱自由、讲民主，但缺乏社会主义法制与道德观念；关心国家大事，有开拓进取精神，但一些学生存在着怀疑四项基本原则，脱离党的领导的自由化倾向等特点。这些人大声疾呼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别要求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毕业生。有人还提请人们高度重视国内外敌对势力同党争夺下一代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一方面表现在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动摇青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方向上；二是用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青少年的心灵。可惜当年这些呼吁没有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足够重视，没有转化为具体决策和措施。

2. 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人一致看到80年代青少年犯罪具有低龄化、突发性强、手段残忍、团伙犯多、文化低、工农子女多、经济犯罪多、女青年犯罪增加等特点，在犯罪原因上有的人认为主要是十年“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其理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这代人的家庭及自身种下了错误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有的不赞成这一看法，认为既要看到“文革”的影响，又要看到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国际大气候。青年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不适应，不能抵制随开放而来的西方腐朽文化与生活方式影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跟不上形势；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认识不足；不愿承认犯罪是阶级斗争现象，忽视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和国外敌人和平演变的伎俩，从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抵制不力等原因，才是引起青少年堕落和犯罪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人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犯罪原因都应该看到，这代失足青年既是社会的累赘又是受害者，由此对他们要从爱字出发、教字着眼、帮字入手、拉字上使劲，促使其转变。同时要以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要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远大理想和道德情操。

3. 关于青年就业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青年就业是实现社会价值与谋求物质文化精神需要的途径，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青年就业主要是如何广开门路、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一部分人认为主要是控制人口盲目增长，从战略上解决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发展速度所导致的就业不足、隐性失业严重、劳动效率提不高等问题。也有的人认为主要是青年素质低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料、发展多渠道就业。近几年人们较关心农村劳力挤城镇就业问题。有的人认为，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的人认为，农村青年应尽可能就地创业，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村两个文明建设，不应大批流入城市挤压城市已经饱和的劳动市场，增加城市负担；有一些人认为，城市就业不足主要是二、三产业发展不够，主张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扩大就业门路。有人认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适应的。虽然二、三产业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但也不可脱离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盲目发展，要防一轰而起，一轰而散。有的人认为四川三百年内人口从9万余人

(《四川通志》中官方统计1685年为18509丁,再按一丁五口比例合92545人)增加到一亿多人,这不仅是计划生育工作问题,而且也与历代政府把四川当作“人口仓库”,只迁进,不迁出有关。由此,解决劳力资源过剩还应重视劳力输出。有的人指出现在全国各省劳力资源均丰富。西北地区虽缺劳力,但尚待开发,群众不愿去,向国外输出劳力,又因技术质量低,缺乏竞争力,最终的可靠解决途径还是在现有生产资料上挖潜,并逐步扩大生产资料。有的人认为,四川资源很丰富,但技术落后,商品生产和商品意识差,大量输出原材料和粗制商品,这样自然会影响就业岗位增加,由此,必须从提高四川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入手,改变“第三世界”——主要靠输出原材料的经济发展面貌,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四川商品竞争力和增加劳动岗位。有的人还提出,虽然这几年由于提倡自谋职业和发展集体经济就业,就业矛盾没有前一年代突出,但是不可过于乐观。其一,“文革”中盲目超生的一代人正在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就业高峰期并未过去。其二,个体经济很不稳定,解放后形成的一次性就业,正在变为多次性就业。进出相抵销,实际待业人数可能会不断上升。其三,现在城镇劳动岗位已经超负荷,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劳力需求,四川就业问题仍是十分严峻的。由此,也有人提倡低收入高就业。用提前退休、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劳动班次等办法来扩大劳动岗位,增加就业人数。

4. 关于婚姻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四川婚姻基础在两极分化,即城市转向以爱情为基础,农村包办婚、买卖婚、裙带婚在上升。少部分人认为城市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不很多,为名利、地位、金钱、长相、享受等结婚的不少。

1) 在婚姻观念上。一部分人认为“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基本消失。另一部分人认为,“门当户对”的封建择偶观并未消失,只是变化了内容。如今的“门当户对”主要表现在找“靠山”,嫁个有钱有势的家庭。还有人认为如果从金钱、地位上看“门当户对”,自然是封建等级婚的遗风,应该摒弃;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化条件上看,同一阶层的子女、同一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有不少共同兴趣、爱好,有相近的是非尺度和价值取向,比如知识分子阶层的子女,一般对书感兴趣,对体力劳动不感兴趣,待人比较大方,语言较文明,而农民和小手工业子女,对赚钱感兴趣,对学习不很感兴趣,语言有时较粗俗,所以,若选择与自己有共同社会化土壤的恋人,有利于两颗心灵的和谐,也不能说是搞“门当户对”。有些人认为,当代青年择偶是爱情第一,才能第一,长相第一;有些人认为,对于独立谋生的城市妇女说来,可能是这样,在农村仍然是环境条件好、家庭富裕第一。

2) 对贞操观问题,有些人认为,一提贞操,不少人就把它与封建观念联在一起,这不科学。无产阶级不是不讲贞操,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他们认为妇女的堕落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我们应该批评的是男子对妇女的性独占和“三从四德”旧道德,提倡相互忠贞,反对资产阶级那种不负社会责任的性行为。这些年未婚同居高达50%以上,酿成了一些“屈打成招”,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也与不清红皂白反对贞操有关。有的人认为不能再提贞操,关键要看有无爱情基础,四川的主要问题还是要反封建婚姻观。有人还说,只要是为了爱情,至于和谁发生性关系,是结婚还是私通,都不是主要的,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讲过的。另外一些人认为,不能断章取义理解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所说的“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的性交新道德标准,明显指的是既要是婚内、又要有爱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恩格斯严厉地批判过婚内强奸,认为那是极不道德

的。

3) 关于离婚问题。近几年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人们议论得更多的是离婚。理论界对此问题当然会额外关心。首先,离婚率升高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呢?还是社会道德沉沦的表现?理论界一部分人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其理由是:①证明中国人有了全面的婚姻自由权利,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凑合婚姻正在瓦解。②证明中国已摆脱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观念,正飞速向现代化社会前进。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生产,必然形成妇女对男子的依赖,如今增强了独立意识和婚姻自由的物质基础,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创造了条件。有人还列举了西方和苏联的离婚率为例,说明工业化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这一事实。③证明妇女解放程度在提高。调查证明,过去大多是男子离弃妻子,80年代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则大于男方。这说明妇女解放程度和自由权利正在上升。

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率上升,即使不是社会道德的沉沦,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更不能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其理由是生产力发展并不会提高离婚率,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过去生产力水平不高,铸就了不少“凑合婚姻”,随着工业化到来,妇女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才有力量反叛“凑合婚姻”,追求有爱情的婚姻,从而使得在新婚姻法公布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来离婚率有所上升。

我们认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要看它对当时社会运转起何种作用。不同时期的离婚有不同的本质。80年代初期的离婚是新婚姻法公布后对现成婚姻合理性因素的反思,也有对“文革”的“派性婚”、“同病相怜”婚、“凑合婚”、“难友婚”的婚姻基础的反思,是对无爱情基础婚姻的一次大解脱。因为1980年的婚姻法比1950年的婚姻法前进了一步,它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条件写进了婚姻法,这就给了离婚以较大的自由。历史证明,每次婚姻法公布后都有1—2年的离婚高峰期出现,50年代也是如此。从解除无爱情的婚姻、促进和睦家庭产生与社会安定上着眼,婚姻法公布后离婚率的短期上升现象,应该说是健康、正常的现象。然而从8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人把商品交换原则引进婚姻生活,出现一些表面上是为了“爱情”、实质上是金钱与美女交易的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离婚的自由化思潮,这又确实反映出婚姻道德上的沉沦,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4) 关于第三者插足问题。四川对第三者概念一般划得较宽,谴责也较强烈。大部人认为,凡和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的人,不论是否通奸、是否引起家庭破裂都是第三者。也有人认为第三者提法比较模糊,容易阻碍男女交往、为倡导“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利用,最好按法律与道德规范要求,挑明问题实质,根据不同事实使用非法同居、通奸、重婚、强夺人妻、破坏他人夫妻关系等法律术语为好。

对第三者的责任问题,有的人认为凡是第三者均是不道德的,都该惩罚。由此,大声疾呼,要求立法以惩治第三者。另一派意见认为“苍蝇不叮无缝蛋”,如果双方没有情爱裂痕,第三者是很难插足的。由此,主要责任在婚姻当事人。或者是一方对另一方已失去信心,想另寻新欢,从而使第三者乘虚而入;或者是一方长期不给对方以爱反而虐待对方,使对方在第三者面前一拍即合。所以,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上看,主要责任在婚姻当事人。由此,对第三者要区别情况对待,那些插足情感已经破裂、爱情确已死亡的婚姻的第三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相反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既不愿修复感情,而又不同意离婚,蓄意把对方“拖老”、“拖死”、“拖犯错误”,甚至有意进行性虐待或人身虐待的人。有的人认为不管怎样,第三者都有道德责任,只要对方没有离婚,介入他人婚姻都是不道德

的。如果别人情感已经破裂，也应等离婚以后才可去相爱。

在对第三者的处理上四川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大都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另立什么惩治第三者法律。

5. 关于家庭问题。四川这几年的家庭研究重点是放在农村。通过调查研究，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1) 专业户比一般农户家庭人口多，代数高，夫妻对数多，核心家庭较少，单身家庭少，这种家庭结构有利于生产功能发挥。2)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得到恢复，家庭成为一个以生产为核心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系统。教育、生育功能随生产功能的恢复也相应起变化，家庭关系、家庭素质和家庭结构也起了前进性变化。3) 本世纪内二代同居的农村家庭将稳步发展，但其规模也不会太大，联合家庭将逐步减少。4) 在家庭关系上，家长制将逐渐被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取代；家庭关系的功利性质会逐步减少，家庭关系将更多地依赖于感情维系。5) 纵向家庭轴心正转向横向家庭情感轴心，即血缘情感淡化，夫妻感情变浓。6) 农村家庭生活方式正在由封闭转向开放；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由追求物质消费转向注意精神消费；由传统的种养业为中心向二、三产业发展；由片面依靠体力转向注重智力投资；由家庭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

有些同志认为在看到十年来农村家庭进步方面的同时，也不可忽视：1) 四川农村家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农民还很穷，家庭中封建、迷信色彩很浓。2) 家庭承包责任制碍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发展，从农村现代化着眼要逐步提倡联营和集体经营。3) 家庭生态农业发展缓慢，掠夺性经营农业仍然存在。4) 家庭商品农业、文化农业发展也很不平衡，部分地区仍然是原始的经营耕作方式。5) 小家庭的大量涌现促使农村住房占地严重，人均土地面积越来越少等。少数同志还认为，不能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作中国农业的长久方向。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上看，农业的发展前途仍然是集体化、专业化，不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承包。当然，不能走过去强制集体化、吃大锅饭的老路。

此外，四川社会学界还就妇女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老年人问题等开展过广泛讨论，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

### 三

反思10年四川社会学研究，笔者认为，其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方向比较明确。社会学界一开始即注意了重建什么社会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见解注意及时引导和批评，故而在这支社会学队伍中尚未发现典型的自由化作品和代表人物。

第二，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面向改革、开放，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本地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才有生命力，才能得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支持。

第三，坚持双百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泛团结各方面、各学科的人员开展社会学研究，发挥集体力量，注意与实际部门的人员配合，才能搞好调查研究。

此外，要加强横向联系，注意与国内外、省内外的学者交流信息，取长补短，互通情报。

邓小平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

正高举。”（《邓小平文选》第165—166页）笔者认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不足是调查得多，深入研究、提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对策性建议太少；对微观社会现象研究较多，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转等宏观问题探索不够；对静态现象研究多，对动态变化及趋势研究不够。在社会学自身建设上，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移植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尚未创立起来，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遗产还未很好挖掘、整理出来。在调查研究方法上，这些年有重西方现代社会学方法、忽视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倾向，还没有探索出一条两者有机结合的道路来。我们以为这些均是我省社会学研究今后应该重视的问题。

1989年9月24日于成都

主要参考文献：

**A、专著：**

- (1) 《社会学——历史、理论、方法》，袁亚愚、唐一之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9年第2版。
- (2) 《改革与农村家庭》，赵喜顺主编，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版。
- (3) 《青年学》，黄志坚、文献良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 (4) 《社会学文选》，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编，1983年内部出版。
- (5) 《四川青年研究论文选》，四川社科院社会学室编，1982年内部出版。

**B、论文：**

-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唐一之、宋道全，1983年《社会科学研究》。
- (2) 《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认是社会学》，袁阳，《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
- (3) 《论社会学中国化与现代化》，袁阳，《社会与研究》1988年第1期。
- (4) 《略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简仕明，《毛泽东思想研究》1984年第3期。
- (5) 《周恩来社会学思想初探》，姜忠、杨先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 (6) 四川社会学1——6次理论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 (7) 四川婚姻家庭和妇女研究会各次理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 (8) 四川青年研究会各次理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唐军